

ZONGLUN

ZHEJIANG

纵论浙江

主编 何福清

副主编 蓝蔚青 张仁寿 盛世豪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ZONGLUN

ZHEJIANG

纵论浙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论浙江/何福清主编.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7

ISBN 7-213-02586-4

I.纵… II.何… III.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浙江
省 IV.D61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290 号

纵论浙江

何福清 主编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王志坚
- 封面设计 郦文龙
- 责任校对 张振华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 开 本 787×1092 1/16
- 印 张 35
- 字 数 57 万
- 插 页 2
-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2586-4
- 定 价 6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活力的源泉

——解读浙江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引 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活力格外引人注目。2001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24亿元增加到6748亿元,在全国的位次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年均增长率高达13.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31元增加到14655元,由全国第14位跃升为第4位;财政总收入由27亿元增加到856亿元,居全国第5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332元和165元增加到10465元和4582元,由1980年的全国第9位和第8位上升到均居全国第3位,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9倍,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自1985年开始已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特别是1997年以来,在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内有有效需求不足、国家投资重点逐渐转向中西部的背景下,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强劲拉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1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2777亿元,比1998年增长50.3%,投资总额在全国的位次从第5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出口达到230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1倍,增速自1999年以来一直居沿海省市首位,特别是一般贸易出口达到182.6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2倍,增量占全国一般贸易增量的42.5%,总量跃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比1998年增长27.9%和20.3%。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空前活力,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

注。论自然资源,浙江陆域资源贫乏,人均耕地只有5分多,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论经济结构,浙江原来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论资本供给,国家投资和引进外资都不多;论区位条件,地处沿海并非浙江独有;论政策环境,浙江也没有享受特殊的优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浙江经济能够知难而进,脱颖而出,乘势而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浙江经济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率先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机制和社会氛围。

一、观念先导:与时俱进强化精神动力

浙江经济的活力靠的是浙江人的活跃,而浙江人活跃的精神动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走在时代前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基础上,率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在所有制结构和运行机制上较早地突破僵化观念的束缚,开创了“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的波澜壮阔局面。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浙江人进一步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确立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掀起了“改体制转机制、抓投资引外资、搞开放促开发”的新高潮。

党的十五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中共浙江省委引导全省人民瞄准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确立一系列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思路、新观念。全省上下心齐、气顺、劲足、实干,形成了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生动局面。

回顾二十多年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广大干部群众身上最为突出的,是坚忍不拔的创业观念、奋发有为的自强观念、不图虚名的务实观念和敢为人先的创新观念。

1. 坚忍不拔的创业观念。

浙江人宁肯苦干,不愿苦熬。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仍然像地下的熔岩,不断地寻觅着喷发的火山口。特别是人口与资源矛盾尖锐的温州等地,当时被称为“地下经济”和“黑市交易”的个体工商业就已相当活跃,一些乡村20世纪(以下凡涉及“20

世纪”，均省略）60年代末就有一半以上劳动力外出谋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的脱贫致富冲动迅速变为创业实践。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为成功的创业者。

为了创业，浙江人四海为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足迹遍布天南海北、长城内外，忍辱负重，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弹棉花的风尘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深入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缙云鸭农走天下，江山养蜂遍神州，风餐露宿，在所不辞。萧山新塘乡农民走村串户收购鸭、鹅羽毛，使萧山成了世界羽绒之都。仙居农民从全国各地乃至越南、俄罗斯回收含银废料废液，一年加工交易白银500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可以说，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便会兴起市场。

创业需要有坚忍不拔的劲头，敢冒风险的胆略。在浙江，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都经历了创业的艰辛、风险的考验。现为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企业飞跃集团总裁的邱继宝，当年没有“资格”参加广交会，硬是背着样品翻墙进入会场。中国小商品城乌鲁木齐分市场的创办人施仲谋，1987年闯新疆时曾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没收全部货物，最窘迫时口袋里只剩2.7元钱。90年代以来，参加西部大开发的浙江人越来越多，目前已近百万，共投资900多亿元，创办企业7000多家。浙江人敢冒风险的精神突出表现在勇于走出国门去闯荡国际市场。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浙江商人的身影。科索沃战争硝烟未散，浙江人就冒着炮火把生意做到了南联盟；美国的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

难能可贵的是，浙江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一些资产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企业家，在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上一掷千金，自己出门却连差旅费都要精打细算。义乌“浪莎”袜业资产上亿元，董事长翁荣金的办公室至今还是一间平房。杭州“未来”米粉是国内最大的幼儿米粉生产企业，企业经营者1998年捐给长江洪水灾区100万元，而自己穿的却是旧的确良衬衫。我国最大的珍珠产地诸暨山下湖镇，年成交额超过10亿元，大批养殖专业户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们仍然四处奔波，到省外承包珍珠养殖场，常年在水田旁的草棚里度夜。“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正是浙江许多企业家生活的生动写照。

2. 奋发有为的自强观念。

浙江人不奢望天上能掉下馅饼,惯于自立自强。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拿不到国家投资的项目,就寻找市场适销的产品;享受不到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走南闯北到处采购。改革初期,作坊式小厂和集贸式市场就这样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由此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做城里人的梦也是靠自己来圆:自己出钱建农民城。在浙江,曾被人们视为保守、落后的农民,恰恰最少有“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他们自求发展,自担风险,自发地进行各种各样冲破旧体制的试验,建设着一个充满活力的浙江。

浙江人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得更加突出。下岗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1996年,温州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但很少有人找政府要工作,都是自谋职业,自寻出路。遇到困难,不求别人靠自己。1994年,温州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市区积水1米多深,滩涂养殖遭受灭顶之灾,企业损失惨重。但是风过水退,听不到叹息之声,没人向政府要救济,开店的减价甩卖浸泡商品,办厂的检修厂房设备,种田的抢播秋季作物,到处一派繁忙的自救景象。景宁畲族自治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老百姓“不靠输血,自己造血”,以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开发境内丰富的水力资源,全县直接或间接参与小水电开发的人数达4万余人,大大加快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在自立自强的奋斗中,浙江人学到了“无中生有”的本领。余姚不产塑料,却享有“塑料王国”的美誉,当地的中国塑料城内有3000余种塑料制品,成了全国塑料市场价格的“晴雨表”;桐乡不出羊毛,海宁不产皮革,却分别拥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和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但年产胶合板335万立方米,总产值30多亿元,成了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中心。如此种种,被一些专家称为浙江的“零资源现象”。

3. 不图虚名的务实观念。

浙江人不尚空谈,踏实苦干,讲求实效。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卓有成效的做法,无论别人怎么议论,也决不动摇。面对指责,不屑于争论;面对成绩,也不愿炫耀。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看成分看表现”,着眼于“三个有利于”;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重形式重实效”,“先生孩子后起名”。只要能发展,国有企业勇于借鉴私营企业的灵活机制;只要有效益,私营企业也乐于移植国有企业的有效经验。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抓住了一个个改革机遇,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

的先发优势。当一些地方对办市场还在犹豫不决时,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星罗棋布,红红火火;当一些地方囿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而固守单一的公有制时,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当一些地方还在寻求国有企业承包经营的具体做法时,浙江的国有企业已经悄然展开产权制度改革。由于赢得了发展时间,终于先行一步走向市场经济。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创业。他们继承前辈“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传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经商或合伙办厂,赚一分钱不嫌少,赚十万元不嫌多。温州农民的“第一桶金”,是靠带着“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走南闯北,从缝纫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中淘出来的;湖州织里农民打造出“中国童装之都”,是靠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义乌农民今日的富裕,是靠经营小商品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绍兴农民的原始积累,是从“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中流出来的。一大批昔日默默无闻的泥瓦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在逐步积累创业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一步步从“草木才子”成长为经营者和企业家。宗庆后靠借14万元承包校办企业,从卖作业簿、棒冰赚小钱积累起家,10多年时间把“娃哈哈”发展成占中国饮料总产量15%的“第一巨人”,并在中西部地区投资8亿元,设立12个生产基地,成为中国西部开发的成功典范。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敢于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子。改革初期,浙东北地区凭借毗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首先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州地区继承务工经商的传统,创造了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模式;浙中的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走出了一条以商促工、兴商建市的路子;浙西的衢州依靠“来料加工”,有效地启动了后发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舟山凭借海岛资源优势,大做“渔、港、景”文章。这些从实际出发探索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不仅都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而且通过在实践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正在逐渐走向融合,共同构成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

4. 敢为人先的创新观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浙江人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具有钱江弄潮儿的无畏气概和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他们就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在更广

阔的领域中和更高的层次上弘扬创新精神: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将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开创了全国水权交易的先河;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被认为是“国内上市公司的标准进一步向国际靠拢”的重要标志;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第一个对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透过这众多的“全国第一”,可以充分看到浙江人持久不息的创新热情。

浙江人勇于创新,而且永不止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中国国企改革的风云人物冯根生,被称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家。他在80年代初率先改革国有企业用工制度,90年代初通过合资转换经营机制,1997年又率先尝试经营者持大股,不断创新国企体制;同时将古老的中药传统文化与最新的生产工艺设备相结合,创立了全国惟一以药品名称命名的“中国驰名商标”,使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创利水平多年稳居全省制药行业之首。昔日的掌鞋匠、今天全国民营企业排位第七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18年来一直把创新视为天职。他不仅十分重视企业制度创新,推动企业从创业之初的股份合作制到成立合资公司(1991年)、组建集团(1994年),再到实行股份制改造(1996年),使原先的家族制企业变为有106个股东的股份制企业,他个人的股份从占60%下降为28%;而且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如引进先进设备和高级人才,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在美国硅谷设立研发机构等,终于将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年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的大企业。现在,创新已经成为愈来愈多的浙江人的自觉行动,不断推动着浙江经济实现新的飞跃。

创新不仅需要个体的勇气,还要有良好的客观环境。浙江各级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默契配合和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80年代初中期,温州和台州的农民发扬当地农村合伙经营和“打硬股”的传统,亲帮亲、邻带邻,创办起“自筹资金、合资合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了个人财产的私有共用。当地党委政府对此采取了不争论、看一看、允许试的态度。1987年又肯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经济性质,给予与集体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同时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企业则顺应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以获得政策支持。1994年,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到3.8万家,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台州市1996年股份合作制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75%,上缴税金占财政收入的65%。鉴于股份合作制成效显著,90年代,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并把许多国有中小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党的十五大之后,省委、省政府进一步鼓励股权向经营者和生产经营骨干集中,鼓励

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逐步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永无止境。正是由于浙江老百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较早地确立起了上述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才使他们成为具有内在活力和强大动力的市场主体。正是由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一次次组织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特别是连续十几年来在全省农村开展的有很强针对性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才使他们真正掌握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迁,生动地证明了先进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力。

二、体制优势: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

富有活力的体制是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浙江的体制优势的形成,就在于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政府是三个相互作用的最基本的要素。浙江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大力促进市场体系发育,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形成了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获得了先发性体制优势,使浙江经济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 率先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

浙江经济在体制上的鲜明特点之一是率先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从而奠定了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浙江地处海防前线,从1953年到1978年,累计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居全国末位。197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3个百分点。因此,浙江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只能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发展计划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在80年代,城镇主要发展二轻集体企业,浙北农村主要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浙南地区则冒出了一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广大群众还创造了联户经营、挂户经营、合伙经营、合股经营、股份合作等新形式。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提出“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办、户办)一起转”,支持群众的创业实践,较早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成为市场主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必须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

分。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个体、私营经济由于产权清晰,决策自主,利益直接,权责利内在统一,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能够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因而最具活力,发展很快。从1980年到1998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而个私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达到60%。1998年省第十次党代会以后,省委提出要进一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做到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并且把12名优秀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优先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在这些政策激励下,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更加迅猛,成为浙江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到2001年,个私经济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3.5%;个私工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全省人均GDP增长速度最快的20个县(市)中,有2/3以上的县(市)个私经济比重超过50%。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近几年浙江外贸出口扩张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2001年,全省出口增幅为18.2%,而私营企业达到139.6%。

90年代,浙江又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扩大投资,并鼓励它们进入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发展领域,形成了一批新型的市场主体。2001年,全省非国有投资达1747亿元,比1998年增长46.3%,占同期全社会投资比重达62.9%。温州汇丰公司投资2.1亿元,修建苍南县龙金大道;浙江方俊集团出资2亿元,新建浙江北溪水电站;杭州锦江集团投资4.8亿元,建成6个热电厂。近年来,温州旧城改造投入约80亿元,大部分都是利用群众集资和引进国内外开发资金解决的,市政府还从中收取税金和配套费约10多亿元。由于大量利用民间投资,短短10年就突破了浙江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的“瓶颈”制约。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从医院到养老院,从健身房到体育馆,从娱乐场所到旅游设施,大量的民间资本涌入社会文化领域,对增强这些领域的活力起了重要作用。宁波万里教育集团不花国家一分钱,6年办起了8所以“万里”命名的学校,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产业系列,目前积累资产6亿元,拥有教职员工1500名,在校学生1.2万余人。东阳横店集团从1996年起发展影视旅游业,利用荒山荒坡和自然景观建起了11个风格迥异的影视拍摄基地,目前已成为国内拍摄场景最多、拍摄设施最全、规模最大、承接剧组最多的影视拍摄基地,成为“国家4A级旅游区”,被誉为中国的“好莱坞”。2001年在横店取景拍摄的影视剧有30多部,国内外游客达75万人次,基地的文化功能辐射到旅游、道具、餐饮等领域,还出现了群众演员专业村,形成了约500人的“横飘一族”,文化产业链日益拉长。杭州宋城集团投资旅游、房地

产、教育、文化传播、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资产达 20 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开发投资集团。台州吉利集团投资 1 亿元,在台州市兴办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接着又在北京以 8 亿元的总投资兴建北京吉利大学。富裕起来的温州市龙港镇农民,近年来私人办学总投入 6500 万元,相继建起 38 所私立中小学和 151 所私立幼儿园。台州市由企业、个人参与或独资兴建的群众文化经营单位已达 6000 多家,形成了演出、影视、图书销售、体育活动和艺术培训等十大门类的文化产业体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大大加快了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

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使市场主体更具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企业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变革。浙江各级政府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鼓励上规模的家族制企业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现代科学管理的方向进行制度创新,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在个私经济发达的温台地区,20 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已经经历了从家庭企业到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再到公司制企业的递进,其他地区的公司制企业也在快速成长。目前,全省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已有 8.58 万家,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集团达 200 家左右。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法人和个人资金,建立了开放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权责利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产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已经转向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变化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的第二次创业与新的飞跃已经开始,大大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使其成为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国有企业实施改制,增强竞争力。同时,个私经济所提供的税金、资本和大批就业岗位,为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重组、人员分流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截至 2001 年,全省 16930 家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已有 16365 家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多种形式改制。全省国有、城乡集体企业改制面和劳动关系转换面分别达到 96.7% 和 81.9%。全省 294 家重点企业中,有 29.9% 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42.5%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和控制力。2001 年与 1978 年相比,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增长了 39.8 倍,年均增长 17.5%,在全国的位次从第 23 位上升到第 16 位;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居全国第 12 位,销售收入居第 11 位,净资产利润率居第 7 位。一大批国有企业成了各行业的排头兵,国有经济基本上掌握着全省经济命

脉。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在全省电力、通讯、自来水和煤气生产供应业中的比重超过 80%,在化学、冶金等资本密集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中超过 50%,在电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中超过 40%。浙江移动通讯通过改制上市,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同步运作,用超前建设、超前扩容、超前服务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用户总数连续七年保持全国第二。万向集团在全省乡镇集体企业中通过率先实行承包制、政企分开、股份制、股票上市、自营出口、建立海外公司和博士后工作站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由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浙江培育了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多种形式的市场主体,深刻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也有效地调整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始终占优势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企业共生共荣,各展所长,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从根本上奠定了浙江经济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

2. 大力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

伴随着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快速成长,浙江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浙江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建设市场,搞活流通,以商促工,以商带农,对于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以商品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但为广大企业提供了生产要素和产品销售渠道,更重要的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以专业市场为特色的商品市场空前发达。专业市场以交易某一类商品为主,具有现货批发、集中交易、摊位众多、辐射面广等特点。由于市场内经营者数量众多,单个经营者力量不大,无法操纵价格和垄断市场。买卖双方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信号能够迅速地使经营者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灵敏地调节着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由于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搜集信息的成本较低,加上场内经营者都有固定摊位,欺诈和作弊的可能性较小。通过专业市场推销产品的企业,可以共同分享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所形成的营销规模经济。实践表明,专业市场能够有效地为成千上万中小企业提供销售服务,降低交易费用,是一种与中小企业相适应的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创新。

80年代初,随着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工业品市场。温州地区在 1983 年就有 300 多个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超过 10 亿元,并出现了年成交额几千万元至上亿元的永嘉桥头纽扣、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等“十大专业市场”。台州、绍兴等地区 80 年代初也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商品市场。由于商品市场具有“带动一片产

业,活跃一地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连带效应,各级政府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积极规划,并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建设市场,促进了一大批“马路市场”转变为现代商城;在用地、税收、信贷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在地方财政资金的投入、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供给等方面提供帮助,扶持市场发展;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实行市场的管办分离,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投诉和仲裁机构、商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提供全面服务,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了商品市场健康发展。到2001年,全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78个,年成交额4652亿元,平均每1万人有1个市场,每个市场成交额达1亿元以上。其中,超10亿元的市场有78个,超百亿元的市场6个,使浙江成为首屈一指的“市场大省”。作为其代表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连续11年位居全国工业品批发市场榜首,目前拥有50多万平方米营业面积,集中了28大类8万余种小商品。

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蓬勃发展。浙江是个资源小省,对要素市场的依赖很大。“设备靠拆旧,技术靠退休,供销靠朋友”,是许多乡镇企业的初创之路。因此,浙江的要素市场也较早就发展起来了。它促进了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达,但大部分企业长期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动资本主要依靠民间信贷,融资渠道一直是制约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在浙江的要素市场中,民间资金市场最先形成。各地积极发展农村金融合作机构,探索并逐步规范民间信贷市场。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台州率先试点,组建了股份制的泰隆、银座等城市信用社。它们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形成了灵活、高效的信贷机制,成为当地个体、私营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泰隆城市信用社2000年利润2958万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

浙江新增的就业岗位主要来自个体、私营企业,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都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因此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较早。通过积极发展遍布全省城乡的职业介绍网络,不仅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而且吸收了300多万外来劳动力。1997年以来,全省共引进各类人才7万多名,其中2001年引进近2万名,有效地弥补了人才的不足。

浙江高等院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较少,而企业对多种技术要素的需求越来越多。1981年,浙江省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技术交易会,拉开

了技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序幕。1987年,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浙江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有关技术市场的地方性法规。尔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技术贸易的政策,加强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各种技术交易展览会、洽谈会、信息发布会频频举行,一些地区建立了技术交易场所,一批技术经营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应时而生,技术合同认定和仲裁员队伍逐步形成。2001年,全省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达31.7亿元,实际交易额远远超过此数。

90年代以来,包括土地转让、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房产交易等的房地产市场在浙江蓬勃兴起,盘活了土地和房产,筹集了巨额资金,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200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超过50%。包括证券交易、企业兼并、股权重组、资产拍卖等的产权交易市场也获得快速发展,为企业的优胜劣汰提供了规范化的市场渠道。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商品市场空前发达,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大重组,使企业和企业群体能够把资源配置到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和行业中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

3. 自觉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

浙江不仅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前列,而且各级政府也能比较自觉地实现角色转换,使之与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相适应,并对它们起促进作用。

努力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发育。浙江各级政府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创造一个政策宽松的“小气候”。改革初期,各级政府对民间的创新活动,大多采取默认、允许、支持的做法,“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挡,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从表面上看这是“无为而治”,实际上却是在理论和政策跟不上实践发展的情况下促进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成长的高明之举。当群众创造了某种新的做法,人们有不同认识时,党委政府往往采取不争论、不压制、不扼杀的态度,冷静观察,不作结论,审时度势;当经过观察分析,认为应当基本肯定时,就大胆给予鼓励,加以引导;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某种做法可行,又得到上下认可时,就予以大力提倡和推广,并尽力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促使其健康发展。省委把这些做法概括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坚持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不照搬;坚持求真务实,少说多做不张扬;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实践,允

许试,允许看,及时总结完善,敢于创新不争论。

不断推进自身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实现职能的转换。浙江各级政府较早地意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身需要适时转换角色,从大包大揽、干预企业经营,转到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上来。凡是该由企业做的、市场能办到的,政府不越位代劳。同时,对建设工程承包、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医药采购等配置稀缺资源的行为,绝大多数实行了公开招标,还权力于市场。政府主要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构筑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的新高地。同时,通过实行以财政贴息为主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环境保护和第三产业发展,有效地调动了市、县政府发展经济、增收节支、开辟财源的积极性。从1998年到2000年,全省各级财政共安排贴息资金25.2亿元,直接带动银行贷款500亿元和社会资金数百亿元。1998—2001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达31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不过205亿元,其余都靠各级地方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金,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克服政府“越位”现象的同时,浙江各级政府精心编织“服务网”和“安全网”。目前,覆盖全省县级以上部门的政府“服务网”已经基本建立。各地普遍设立了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中心和经济环境投诉中心,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衢州市首创“农技110”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和现代传媒的服务功能。玉环县推行全程代理制,将19个县级部门涉及的268件办事项目全部纳入便民服务中心,平均每个月受理1万多件,办结率为100%。各级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审批制度,科学设置审批职能,规范事权和审批程序,推广“政务公开”,实施权力运行“阳光工程”,大力推行“一门受理、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审批方式。2000年以来,省级50多个部门共减少审批、审核、核准等总事项1277项,总事项和审批事项分别减少50.6%和58%,各市、县也都至少削减1/3审批事项,全省还取消了154项检查和达标项目的评比。2001年,浙江率先制定颁布了政府行政审批规章,明文规定政府设置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履行调研、听证、报批等法定程序,接受社会、人大的监督,从而将政府职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财税管理方面,实施了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收支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会计委派制度、“收支两条线”制度等等,使权力获得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保障,也便于监督和管理。

社会保险“安全网”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到2001年,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485.3万人,企业养

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 99% 以上,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达 391.1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 210 万人,医疗保险人数达 386.2 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做到全部按时足额发放,为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基础。浙江还在全国率先实行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贫困农民也享受到生活保障。

4. 集中精力抓好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省委、省政府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统揽全局,贯彻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的指导方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事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各级政府围绕这些决策的实施,进一步转变职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引导、服务和调控上,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效果。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效益农业。针对农业的阶段性变化带来的粮食过剩、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问题和浙江劳动力成本高的实际,打破粮食生产自求平衡的格局,率先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使农民充分拥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引导农民面向市场,“什么来钱种什么”,大力推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和手段搞农业。建设区域特色农业基地,培育特色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发展品牌农产品,形成规模化生产布局;鼓励工商企业投资效益农业,着力提高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加工增值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这些措施使农业增添了活力,农产品增加了竞争力,农民增强了市场意识和开拓市场的能力。从 1998 年到 2001 年,全省粮经面积比由 71:29 调减为 59:41,农民的农产品商品性收入 2000 年、2001 年分别比 1998 年增长了 11.2% 和 4.6%。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进程大大加快,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开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针对浙江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的特点,主动进行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注重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工业用地等生产要素向技改倾斜,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1998 年以来,各级财政共安排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113 亿元,全社会技改投入 2366 亿元,提高了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全省工业增加值实现年均 11.6% 的高速增长。到 2001 年底,在 28 个制造业大类中,利润增幅超过 20% 的有 15 个,利润总额占全国同行业比重超过 10% 的有 14 个,其中纺织、服装、皮革、普通机